

来自渣滓洞的“最后的报告”与“狱中八条”鲜为人知的故事

本报记者 屈建军

专访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两周年前夕，央视《新闻联播》推出了解密“狱中八条”的系列报道，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

65年前，重庆解放前3天，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监狱的绝大多数革命志士被国民党特务残忍屠杀，烈士们在牺牲前留下了一份用血的教训凝结成的、从未完整公开的秘密文件，其中对党提了“八条意见”，即“狱中八条”。

日前，本报记者专程赴重庆市档案馆、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以及歌乐山下的原渣滓洞、白公馆监狱进行实地采访。在走访中，记者了解到65年前一封来自渣滓洞属名为“吉祥”的，向中共党组织递交的“最后的报告”密信还从未公布过……

重庆市档案局馆副局长郑永明，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狱中八条’是重庆市档案馆馆藏革命历史档案《关于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的最后一部分。书写纸张是重庆解放前夕生产的较为粗糙无格机制纸，长18.4厘米、宽25.2厘米，纸质较差。书写材料为蓝黑墨水。书写形式是从右至左竖写格式，字迹虽然较小，但工整清晰。据重庆党史界有关专家考证，该文形成于1949年12月25日，即重庆解放后的第25天。”

在重庆市档案馆调阅“狱中八条”的档案时，记者获悉馆藏档案中还有一份珍贵档案从未对外公布过，它就是一封来自渣滓洞属名为“吉祥”的向中共党组织递交的“最后的报告”密信。

“吉祥”求救密信送出后缘何劫狱计划又落空

无论是小说《红岩》还是电影《烈火中永生》，对发生在重庆解放前夕的白公馆、渣滓洞大屠杀都做了另外一种表现，那就是成功营救狱中被关押的革命者。事实上，营救工作虽然一直在秘密进行，却没有取得成功。

身陷囹圄的革命者，他们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但他们也绝不是坐以待毙，他们更希望活着，去建设新中国。他们为有朝一日能冲出牢狱，始终坚持不懈地进行着努力，狱外的党组织也一直千方百计为解救他们进行艰难的斗争，除通过个别上层人物和个别社会关系营救一些同志出狱外，中共地下党组织还有计划地准备武装劫狱。

1949年7月，川东特委召开了一次会议，南方局钱瑛在对川东中共地下党的指示中，专门提到对被捕的党员和进步群众，要千方百计把他们营救出来。但终因时间短促，中共地下党组织掌握的力量太小，第一次劫狱计划未能实行。

11月14日；敌人继在大坪公开枪杀陈然、王朴等10人后，又在电台岚垭秘密杀害江竹筠等30人。狱中停止了每天一次的放风，岗楼上又加派了双哨，日夜巡逻，集中营里气氛越来越紧张。化名“吉祥”的人，综合狱中党员骨干研究的营救意见，给中共地下党组织写了一份密信，由争取过来的看守带出，最后转交给了沙磁区工作组负责人刘康。

刘康接信后，深知狱中同志生命已危在旦夕，决定单独组织武装营救。刘康与有关同志日夜奔走，在短短的几天里，为武装劫狱组织了人员、装备了武器，并筹集了50两黄金作为劫狱经费。孰料，还没等实施营救，敌人的大屠杀就开始了，第二次劫狱计划又告落空。

记者在档案里看到了刘康写于1982年10月12日的关于这封密信的一份说明材料：

这封信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九日(注：档案记载为“11月21日”)由关押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中的化名“吉祥”的同志写的，通过一个被争取过来的青年看守人“蓝先生”带出来，

交给我联系的地下党员况淑华，在二十一日早晨交给我的。我在收到此信后的一周时间中，曾经和好些同志一道，进行过紧张的活动，决定实行武装抢救；但在准备工作尚未完全作好以前，敌人就在十一月二十七日开始了震惊中外的大屠杀。

现在查明“蓝先生”的真实姓名叫黄茂才，现在还活着。写信的“吉祥”，据黄茂才讲，是胡其芬同志，已在“一一·二七”大屠杀中牺牲。

原信解放前后由我保存了很长一段时间，五五年才交给组织上，现在保存在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的档案里。

“吉祥”是胡其芬的化名。国民党重庆中美合作所特务头子徐远举后来写的回忆录《血手染红岩》“光辉的形象”中是这样描述胡其芬烈士的：“胡其芬，年约30岁，中共地下党员，何北衡（原民国政要、商业家）的家庭女教师，在搜捕刘国鋐时被捕，后牺牲于渣滓洞。她被捕后，她在高滩岩中央医院工作的姐姐曾多方设法营救她，托三青团特务分子陈介生找我说过情。据叛徒刘国定说，胡其芬是周总理的英文秘书。我找她谈过，她支吾其词，连身份都不承认，表现了她对革命的忠诚。”

“蓝先生”的真实姓名叫黄茂才。1945年5月，22岁的黄茂才成为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的一名看守管理员。在监狱工作期间，黄茂才遇到了同为四川自贡老乡的江竹筠（江姐），在她劝说下，黄茂才利用管理员的特殊身份成为江竹筠等共产党员在狱内与战友、狱外与党组织联系的“特殊信使”，并成功地送出了江姐的遗书《示儿》和女牢中共党员胡其芬写的大屠杀前夜紧急报告的秘密信等信件。

一份尘封多年的《报告》缘何缺失了两个部分

1992年，时任重庆市委党史办副主任的胡康民，交给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馆长厉华一叠资料，就是这份尘封多年的珍贵史料，解开了小说《红岩》中的很多未解之谜。

回忆起当年的情景，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原馆长厉华感慨地对记者说：“我从胡老师手中接过资料，一看有好几份，有当年白公馆、渣滓洞牢房关押人员的名单；有当年对殉难者划分甲、乙、丙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之分的名单；有烈士资格评定的原始资料；有一些脱险志士写的书信……尤其是《红岩》作者之一罗广斌写的一份《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字迹虽小，但工整可辨。这份资料把川东中共地下党的两大主要事件《挺进报》和川东武装起义的得与失写得很翔实，对狱中斗争和有关烈士事迹及叛徒、特务的情况记录得有细节。”

后来，厉华在重庆市档案馆看到了这份《报告》的原件，一共有15页，“它在装档案的时候就没有第五、第六部分，保存的只有：一、案情发展；二、叛徒群像；三、狱中情形；四、脱险人物；五、六部分缺失；七、狱中意见（整理总结中共地下党经验时提出的‘八条意见’即‘狱中八条’）”。后来，厉华在罗广斌的档案里又发现了一份他写的《自我检讨》。

厉华说，特别是在这份《自我检讨》中提到个别脱险经过的时候，谈到在大屠杀时脱险的李育生：“结果，五个小组组织好了，准备要动，可是杨进兴从渣滓洞回来了，情形又紧了。李育生把电话线拉断，杨进兴打电话不通。”还有一处在写到脱险出白公馆的时候：“1点40分，管理人员走了；1点50分，我们出来到楼上找到蒲太太和两个小孩，一道出走。门口，突然看见特务白佑生，我当时想杀他，但也没有全部勇气，别人一拉也就算了。”这里所记述的李育生，在《报告》的12页确有李育生的介绍；记述的特务白佑生，在《报告》的11页也确有白佑生的介绍。

厉华说，《自我检讨》里，专门记录了“特务罪行”和“烈士典型”，这应该就是缺失的两部分。因此，他推断“特务罪行”可能当时被公安机关拿去用于抓捕特务，而归档在公安系统的档案里；“烈士典型”被拿去作了当年烈士资格评定的参考资料，则可能被归档到烈士资格评定的卷宗里了。

罗广斌出狱后写的《报告》交给了肖泽宽（重庆解放后任市委组织部长）后，组织上进行了认真审阅。在罗广斌档案卷二中，厉华还发现与这份《报告》纸张、书写格式、行文完全一样的一页“补充材料——被捕原因及审讯情形”，落款时间是“1950年8月18日”。这个补充材料，也

应该是这个《报告》第八部分“自我检讨”的补充。组织上在审阅这个报告几天后，又让罗广斌对被捕、审讯问题再详细补充，也是组织要对脱险和狱中情况核实调查的必要。

厉华说：“1949年12月，罗广斌就把这份《报告》整理完并交给了党组织，到1950年7月以前，党组织对《报告》内容进行了核实，时间长达半年之久，对于狱中的情况，除向其他脱险人员调查了解核对外，还包括几个叛徒以及被抓获的特务。同时在基本情况大体掌握的前提下，党组织找罗广斌反复核实《报告》内容的情况，罗广斌还向党组织递交了《对党保证》。落款时间是1950年7月31日。”

“狱中八条”缘何说是血与泪的嘱托

1949年11月27日，特务开始了最后的屠杀，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必须当天处决完所有政治犯。由于渣滓洞关押人数较多，白公馆的枪手后来被调到了渣滓洞帮忙，白公馆只留下看守班班长杨钦典独自看守尚未屠杀完的19位志士。经过攻心工作，杨钦典同意打开牢门，19人全部安全逃出，渣滓洞也有15人逃出。在整个大屠杀中，共有285人遇难，只有34人脱险。

11月30日，重庆解放。原中共川西特委委员车耀先的二女儿车毅英离开欢迎人民解放军进城的人群，独自一人跑向歌乐山。她还不知道被捕多年的父亲早已被秘密杀害，还以为父亲就关在歌乐山的监狱里。

多年以后，车毅英这样描述当日的所见所闻：“白公馆里人去楼空，渣滓洞的余烬还在冒烟。渣滓洞楼下的8间牢房里堆满了烧焦的尸体，没有头，没有足，只有一块块焦黑的躯体。围墙的缺口处、房前屋后、厕所内，另有20多具尸体躺在那里。松林坡上三个大坑，里面尸体枕藉，血水横流。看见一个个死难者睁目仇恨的眼神、紧握的拳头和流出的鲜血，我说不出一句话。歌乐山上一点声音也没有，可怕的寂寞，一片荒凉。”但是，当越来越多的人涌向歌乐山寻找亲人、朋友和同学时，山林再也无法沉寂下去，哭喊声处处可闻……

在大屠杀的过程中，先关押在渣滓洞，后又转押至白公馆的共产党员罗广斌脱险后，怀着无比悲愤的心情将狱中同志们的讨论，尤其是狱中党组织的分析、总结和建议，写成了一份《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的第七部分“狱中意见”（即“狱中八条”）中，烈士们留下了八条饱含血与泪的意见：（一）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整党整风；（八）严惩叛徒特务。

厉华说，“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是“八条意见”的核心。《报告》中指出：“经济、恋爱、私生活——从所有叛徒、烈士中加以比较，经济问题、恋爱问题、私生活这三个个人问题处理得好、坏，必然地决定了他的工作态度和对革命的是否忠贞。刘仲益、蒲华辅在经济问题、私生活上，腐化倾向特别严重；而恋爱问题，是每个叛徒都有问题的。在工作上，因为经常检讨，报告犯了毛病，容易发现，也有较多的改正机会；而私生活，一般是不大注意的，但是，在这些问题的处理上，却清楚地反映了干部的优劣。”

厉华举例说，叛徒李文祥，叛变前是重庆市工委下属的城区区委书记。1948年4月17日，他被刘国定出卖被捕入狱。李文祥虽然受住了敌人的严刑拷打，但没有经受住感情因素的诱降，当特务以“最后一次同太太见面”相威胁时，他在坐牢8个月后，向特务机关“坦白自首”，出卖了何柏梁等10多人，并参加特务工作，被军统授予上尉军衔。1951年2月，李文祥被重庆市公安机关判处死刑。

在分析了客观上的原因后，罗广斌又分析了主观上的原因。他在《报告》中写道：“没有学习，没有积极地要求自己进步……没有经常的组织教育。”这是领导人蜕化成叛徒的基本原因。因为“毒刑、拷打，单凭个人的勇气和肉体的忍耐，是没有法子忍受的。没有坚强的革命意识，没有牺牲个人、贡献革命的思想准备，便不能通过考验……”

叛徒与特务的下场只能是“弃尸于荒郊，与草木同腐”

“狱中八条”最后一条就是“严惩叛徒特务”。正是这些叛徒，让很多革命志士身陷囹圄。

厉华介绍，川东中共地下党有十几个叛徒，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对党的纪律不以为然。第一个叛徒任达哉，1946年在恢复党籍时，没有如实说出自己在执行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期间，为获得生活来源私自参加军统情报通讯员的经历。

刘国定贪恋城市工作，不服从党组织调到基层工作的命令，被捕后苟且偷生。叛徒涂孝文，面对党组织被破坏，不执行立即转移的要求，被特务给逮住。叛徒冉益智在私底下曾经对人说：“共产党员在群众中起领导作用，以身作则的态度是装出来给群众看的。”

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是小说《红岩》中的头号反派人物徐鹏飞的原型。他在《血手染红岩》一文对叛徒的记载中写道：“……主要是叛徒经不住考验，在临危时丧失了革命的意志，否则特务们将一筹莫展，瞎碰一气……有少数不堪特务的威吓利诱，有的叛变了，有的投降了。叛变的主要有刘国定、冉益智、骆安靖、李文祥、李忠良、涂孝文、陈为智等人。”

叛徒刘国定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冉益智是副书记。这两人身居要职，却在被捕后双双叛变，致使重庆乃至整个四川地区的地下党遭受严重破坏。刘国定觉得自己官大，还和特务讨价还价要当少将，挂了个中校军衔，最终升为上校。被刘、冉二人直接或间接出卖的中共地下党员，大部分牺牲在渣滓洞和白公馆。

厉华说：“重庆解放前，刘国定苦苦哀求保密局头子毛人凤让他去台湾，自然被毛人凤一脚踢开。他又筹措路费想逃往香港，但借不到钱，只好先逃到成都，后来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更有戏剧色彩的是冉益智在重庆解放的第三天居然跑到“脱险同志登记处”，厚着脸皮找罗广斌要求登记，被脱险同志认出，一顿训斥，叫他赶快去投案自首。冉益智匆忙溜走。半个月后，冉益智在路上碰到了国民党军统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李修凯。李修凯当时已向人民政府自首，急于立功表现，他一见冉益智就喊：“你这个大叛徒，跟我到公安局去。”冉益智也高喊：“大特务！”两人边叫骂边扭打，推推搡搡，被巡逻的解放军发现送进了公安机关。1951年，刘国定、冉益智、李忠良、李文祥4人被重庆市人民法院判处死刑。临刑前，冉益智自己要求将尸体“弃之于荒郊，与草木同腐”。

白公馆副所长杨进兴后来改名杨大发，潜逃到四川南充县青居乡。在那里，他换上土布衣服，租了几亩地，当起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后来，在减租退押和土改中，杨进兴狠斗地主阶级，因此被评为贫农，不仅分了田地，还当选互助组小组长。1952年8月，有人偶然听到杨进兴夫妻二人斗嘴：“你恶啥子？你自己干过些啥？政府现在到处捉特务，你敢到乡上去坦白吗？”1955年，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乡亲们把这个可疑情况反映给公安机关。经调查，人们才知道，这个“杨大发”正是杀害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中共川西特委委员车耀先的刽子手。杀害杨虎城将军、小萝卜头以及制造“11·27”大屠杀，他都有份儿。1958年5月16日，杨进兴被执行枪决。

渣滓洞看守所看守长徐贵林，就是小说《红岩》中的“猫头鹰”。“11·27”大屠杀之后，他被编进了胡宗南部76军80师，在战斗中被解放军俘虏。当时，解放军并不了解他的底细，就当作一般俘虏关了。徐贵林偷偷潜回重庆南岸弹子石地区，挑起菜担子，走街串巷卖起菜来。他满以为在弹子石这样的偏远郊区是不会有人认出他来的。但公安机关很快就发现了他的踪迹并迅速实施逮捕。1950年5月18日，重庆解放碑前召开千人群众大会，重庆市军管会当场宣布了对徐贵林执行枪决的命令。

坐镇指挥了血洗白公馆、火烧渣滓洞之后，特务头子徐远举逃往成都，后又赶到云南昆明。镇守云南的卢汉将军宣布起义时将徐远举等人逮捕，1950年3月将其移送重庆。

厉华说，历史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1950年6月，36岁的徐远举头上冒着汗，双腿打着战，被送进了白公馆。那时，白公馆已经由国民党军统局监狱变成了解放军战犯管理所，曾经关押革命者的牢房里，住进了特务头子和刽子手。1956年，徐远举被转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他积极接受改造，表现很好。1964年，徐远举以《血手染红岩》为题写下数万字的材料，详细交代了自己破坏《挺进报》和四川中共地下党组织、逮捕审讯共产党人，以及制造一系列大屠杀的全过程。

程。1973年，徐远举突发脑溢血，在北京复兴医院抢救无效病故。